

中西文学史学思想 比较研究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A Comparative Study



陈 宇 刘智勇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辅华
责任校对:楼 晓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学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 陈宇, 刘智勇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690-0628-5

I. ①中… II. ①陈… ②刘…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思想史—文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8798 号

书名 中西文学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ZHONGXI WENXUE SHIXUE SIXIANG BIJIAO YANJIU

著 者	陈 宇 刘智勇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0628-5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6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前 言

众所周知，中国与西方世界都拥有悠久的文学发展史与文学史研究、编纂史。自西方的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代起，分属于中、西两大文明的众多学者和思想家就开始了编纂各自文明体系内文学发展史的工作。虽然最早出现的这些文学史著作一般都有与今日通行的各种“文学史”截然不同的面貌，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中西早期文学史著作的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后世的文学史著作必须具备的理论要素，中西方众多的专家学者们也都曾经用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场合阐述过自己对这些文学史要素的理论认识。通过对古今中西各家文学史理论和实践资源进行比较研究之后，笔者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以下四种要素决定了一部文学史著作的基本面貌：

其一是文学史所要描述的对象。具体说来，就是一部文学史应当叙述和描写什么内容的问题。这一因素决定了文学史著作所反映文学史实的范围以及文学史学家对入选文学史的作家作品所作出的最后选择。

其二是文学的发展方向。具体说来就是看在文学史学家心目中，文学史究竟是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发展面貌的问题。这一因素决定了文学史学家对历史上文艺思潮、著名作家与经典作品等方面的选择与评价。

其三是影响文学发展的动因。具体说来就是要看在文学

史学家心目中，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或者阻碍了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这一因素是一部具备清晰线索的文学史著作的灵魂所在，是避免一部文学史著作沦为作家作品评论汇编所必需的理论核心。

其四是文学史具备的功能。具体说来就是要看在文学史学家心目中，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来撰写或编纂一部文学史著作的。这一因素决定了整部文学史著作的谋篇布局和行文造句，并进而最终决定了文学史著作的整体面貌。

从以上的思考出发，本书将从文学史的对象、文学的发展方向、影响文学发展的动因以及文学史的功能等四个方面开展对中西文学史学思想的介绍与比较研究，试图在带领读者初步了解中西丰富的文学史学思想之后进而对之展开学理层面的思考。

本书的第一章旨在简要梳理中西文学史撰写过程中，在内容方面对“雅”与“俗”二者之中何者更为偏重的变化过程。

纵观世界文学发展史，中国与西方的文学研究界都曾经经历过一个轻视“俗文学”的历史阶段。具体说来，西方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就不重视对寓言等俗文学作品开展评论和研究工作。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但丁率先为俗文学摇旗呐喊，一时间，众多志同道合的文人学者纷纷加入但丁所在的阵营之中，或提出理论，或直接利用俗语开展文学创作实践，终于在全欧洲范围内逐步改变了以拉丁文为语言载体的“雅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样一来，到了19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者基本上都能做到对“雅”“俗”文学一视同仁。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著作撰写史

上，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歧视俗文学的不良倾向，无论是《文心雕龙》还是各正史《文苑传》和《文学传》，都只是偏重于叙述精英文人创作的文学历史，对成就同样突出的俗文学却总是表现出一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忽略态度。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才开始逐渐出现改变的迹象。如果说身为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林传甲因为要遵守清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由“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的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等各方面的要求，继续秉持中国古代文学史编纂传统中的精英主义立场，而在其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采取了鄙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态度的话；那么民国成立之后，旅日学者曾毅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就开始尝试给予之前一直遭到文学史学家忽视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以较大的论述篇幅，从而显示出他对这些俗文学的重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其所提出的“白话文学史观”指导下编纂了《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两部文学通史，在把长期以来被传统文学史学家在中国文学通史性研究著作中所忽视的所谓“白话文学”树立成为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史中的主流的同时，却相应地给予“传统文学”以轻率的贬斥。这样显失公平的做法使真正按照胡适的主张来书写中国文学通史的学者在数量上寥若晨星。大多数的文学史学家虽然在胡适的影响下加大了对“白话文学”或曰“平民文学”的研究力度，却并未如胡适那般将其推崇至一家独大的地步，而是努力追求在各自的文学史著作中对“白话文学”（俗文学）与“传统文学”（雅文学）二者的叙述平衡。胡行之所著的《中国文学史讲话》便是践行这种平衡企图的文学史著作中最典型的代表。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在西方与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历史进程

中,“俗文学”经历了从最初受轻视到逐渐被重视,并最终成了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雅文学”融为一体的历史过程。“雅俗之辨”就此逐渐成为历史,不再被视作是文学史编纂过程中的主要关注点。

本书的第二章旨在研究中西文学史学研究家对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进化的观念在西方是源远流长的,远在达尔文系统的进化论诞生之前,人们就用进化的概念去描述阐释文学的发展过程。这类历史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用有机体(如植物等)初生—成长—兴盛—衰亡的生命过程来类比文学的演变,小至一种文学体裁、风格,大至整个民族的文化。”^①——西方对“文学进化”这一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反思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伟大学者亚里士多德,他对文学发展所秉持的是一种“有机进化”的认识。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影响下,欧洲的学者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大都采取与之类似的学术立场。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循环进化”学说的雏形,19世纪德国学者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思想与“循环进化”的文学发展观融为一体,使这一学说具有了之前所缺乏的学理性,增强了其说服力。在唐代以前,中国文学研究界对中国文学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大致包含“崇古论”“新变论”和“通变论”三种观点,其中以“崇古论”出现最早。持此观点的学者均认为文学的发展是倒退的,这就与后来拥护“新变论”,认为文学的发展一定是今胜于昔的学者形成了鲜

^① 包文忠:《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98页。

明的反差。客观地说，无论是“崇古论”还是“新变论”，都带有一定程度极端化的色彩。古代学者对中国文学史发展进程的研究一旦只执着于一面，就必然会犯下过犹不及的错误。南梁时期文学思想家刘勰在其名著《文心雕龙》中综合前人成说，在对“崇古论”和“新变论”二者各自的长短优劣之处加以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中国文学史发展进程遵循“通变论”的新观点，即认为中国文学是呈一种“复古循环”样态发展的。这种“复古循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都占据着学界的主流地位，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及撰写。但是随着 19 世纪后期以来历史学研究领域内在“进化论”影响下所产生的新历史发展观逐步代替传统历史发展观的情况出现，中国文学史编纂领域中也同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20 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者在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开始抛弃已经秉持了千百年的“复古循环”的文学发展观念。经由黄人、胡适和谭正璧等文学史学家的努力，终于把“文学进化论”的文学发展模式彻底建立起来。虽然以今日的学术眼光看来这样的文学发展思想显得比较极端，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这种文学发展观的提出确实能够起到鼓舞人心、增强国人建设本国文学自信心的积极作用，其在中国文学研究史和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正面意义不容抹杀。

本书的第三章旨在研究中西文学史学研究家对决定文学发展的动因究竟为何这一问题所作出的思考。

自古希腊时期至今的数千年来，西方学者对“推动文学发展的动因为何”这一问题进行了诸多思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在中国学界看来，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想学

说中，尤其以法国学者史达尔夫人、泰纳以及丹麦学者勃兰兑斯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最具特色。史达尔夫人把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看成是对产生在这一地区的文学之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重要因素。泰纳继承和发展了史达尔夫人的学说，进而提出“种族、环境、时代”这决定文学发展情况的三要素。著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勃兰兑斯用自己的文学史创作实践发展和完善了前人的学说，在继承泰纳观点的基础上又特别强调“心态”对欧洲文学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研究界以刘勰等为突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对文学史发展动因问题的认识方面比较偏重于认同具有神秘色彩的“天命”“道”或“神理”决定论，以及作为国家统治阶级代表的君王布施政教和个人爱好的“现实人为”因素。但是随着19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思想在华影响力的日益扩大，这种相对笼统和简单的思维模式就逐渐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具体说来就是在继承前人学说中合理之处的基础上逐渐淡化其原有的神秘主义色彩，逐步开始试图从“现实人为”的角度科学地考察推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多样化动因。郑振铎在继承胡适“民间文学动力说”的基础上又提出“外国文学影响说”，把“外国文学影响”作为推动中国文学数千年来发展变化的基本原因之一，在此后的文学史研究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通过比较上述中西方对文学史发展动因问题的认识差异可以看出，抛开神秘主义因素的干扰而试图探求可以从现实角度加以把握和认识的、推动文学发展的真正根本原因是古今中西文学史研究者们所共同追求的目标。虽然通过艰苦研究后并没有得出十分相似的结论，但是双方学者表现出来的想要对文学史学研究加以“科学化”

和“去神秘化”的美好愿望却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共同的愿景在今后也必将促进全球学界对文学史发展动因问题的持续深入思考，从而继续推动文学史学研究科学化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本书的第四章旨在研究中西文学史学研究家对文学史的功能究竟为何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各种学理思考。

西方学者对文学史功能为何这一问题所做出的解答大致包含两种类型。克罗齐坚持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鉴于文学发展历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历程之间联系紧密，克罗齐认为只有将文学置入更为广阔的人类发展史中，才能真正发现文学史事实的真谛，从而有效地阐明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社会和审美意义。韦勒克则将文学作品视为动态存在的独立结构，其存在形式具有多个层面，而文学史的功能便是考察这些不同层面在历史进程中的动态接受状况，了解读者、批评家和同时代的艺术家们对作品的不同反应，找出其背后的逻辑，最终揭示文学作品的发展规律。由此观之，克罗齐与韦勒克二人之间虽然存在许多见解上的差异，但均认为文学史具有对文学作品阐发与理解的功能，只不过在采取何种方法与路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认识而已。显然，克罗齐与韦勒克提出的两种学说之间的最大共同点就是都强调要注意文学史的“致用”功能。这样的情形与中国古今文学史研究界所表现出来的大趋势是十分相似的。无论是中国古代号称文艺理论百科全书的刘勰所著《文心雕龙》，还是号称近代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抑或是当代以袁行霈、章培恒为代表的著名文学史学家所著的各类专著，这林林总总的著述大都表现出了十分鲜明的“致用”

色彩。钱钟书先生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恰可以成为上述情况的最传神写照。

虽然限于学力和资料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本书在内容选择、章节安排和观点论述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的问题，但笔者依然真诚地希望本书的问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内外有志于从事文学史编纂工作的各位专家学者提供文学史理论资源方面的微小帮助。同时也请各位尊敬的读者对书中的错误和疏漏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陈 宇

2017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的“雅”与“俗”	(1)
第一节 西方有关文学雅俗的争论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中的雅俗之争	(11)
第三节 20 世纪早期国人自著中国文学史中的雅俗之辨	(19)
小 结	(46)
第二章 文学发展的方向	(48)
第一节 “文学进化”——西方学者对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主流观念	(48)
第二节 从“崇古”到“通变”——古代中国学者对文学发展方向问题认识的改变	(57)
第三节 20 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对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思考	(71)
小 结	(88)
第三章 影响文学发展的动因	(90)
第一节 “地理环境决定论”——西方学者眼中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因	(90)
第二节 “天命神理”与“君王政教”——古代中国学者眼中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因	(114)
第三节 20 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对文学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	(123)
小 结	(139)
第四章 文学史的功能	(141)
第一节 西方学者对文学史功能问题的思考	(141)
第二节 中国学者对文学史功能问题的认识	(148)
小 结	(169)
结 语	(170)

参考文献..... (173)

第一章 文学的“雅”与“俗”

第一节 西方有关文学雅俗的争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俗文学”一词，在西方文论语境中并没有一个完全对等的称谓存在，早期文献中也无非常直接的探讨。为了较为清晰地揭示“俗文学”在西方文论发展历程中的演化路径，本节将从两个层面展开考察：第一，文体形式；第二，作为载体的文学语言。

首先来看文体形式方面。

在西方古代文论中，对什么是文学文本并不存在太大的争议，有一个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文学样式、文本与作家群体的标准存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虽然提及了喜剧，并谈到过要写作关于喜剧的理论，但现存文本中却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在此书中，亚里士多德以“诗”作为总称，泛指除了“讽刺诗”之外所有他认为重要的文学形式。具体说来，他通过自己的分析判断，将荷马的“讽刺诗”归入到了“滑稽诗”的范畴。^①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做法说明，在他看来，文学中的确存在“雅文学”与“俗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修辞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35页。

文学”这一对二元文学形式。但令人感到相当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并未被其所处时代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的研究者所关注。大多数的学者并不认为有必要给予文学的“雅”“俗”范畴以严肃的学术讨论。

亚里士多德在其文艺理论著作《诗学》里主要讨论了三种文体：抒情诗、史诗、戏剧，在扼要梳理了这三种文体形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后，又对其各自的文体写作技巧与评判方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介绍。与此同时，在他的另外一部文艺理论著作《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又对演讲稿及散文这两种文体形式的修辞术进行了细致的研究。^①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上述抒情诗、史诗、戏剧、演讲和散文等诸种文体在古希腊文论家的眼中应该是属于同一值得仔细研究的文学范畴的。对于其他未曾被亚里士多德探讨过的文体，虽未曾明确被排除在文学之外，但至少在客观上未被给予与上述几种文体相同的重视。因此，从这些文学形式所获得的来自学者的批评和关注程度中便可以对其在当时的学术界甚至是一般人心中的地位做出合理的推测：我们可以认为，在当时，除了上述被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提及并加以详细讨论之外的其他文体，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被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和上流社会所推崇和重视的。

这一观点也可由下面的例子从侧面加以证明：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其所撰写的著名史学著作《历史》一书中，曾偶然提到过“那个寓言作家伊索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修辞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Aesop **the** fable author) ”^①。虽然伊索出身低贱，是个奴隶，但他的作品也受到当时文学评论者的关注。例如，根据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就曾与别人谈到了伊索的典型创作方式。苏格拉底认为，在面对抽象的人生智慧与道德原则时，伊索会使用寓言故事的形式将它们表达出来。借助于神话故事等方式，伊索将这些抽象知识与原则具体化，^② 更为形象、生动地将其传达给普通的希腊人。伊索也因此获得了学者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当时的学者并未因为作者的低下身份而无视《伊索寓言》这种源自于民间智慧的作品。但是，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均未对这种文体的优劣做出任何置评，也从未提出过与其有关的任何创作或者评价原则。柏拉图虽然在《斐多》中谈到过一次伊索与当时正统文学的关系，但也是间接地通过斐多之口来叙述的：苏格拉底曾将一些伊索的寓言故事改写为诗歌^③。从这种情况可以推断：虽然伊索的作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被当时的主流学者们认可与接受，但是这些学者们对伊索创作的这种故事的形式却并不赞赏，认为寓言是比诗歌、史诗和戏剧更差的文学表达形式。虽然在当代学界看来，《伊索寓言》无疑已经成为古希腊文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古希腊时代，伊索创造的这种“寓言”文学形式虽然并未完全被文学评论者所漠视，但也并未获得学者们更多的关注。这种古今不同时期评价标准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足以引起当今文学史研究界的重视。上述以《伊索寓言》为代表的源

① Herodotus.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of Halicarnasus* (Vol. 1). Harry Carter, trans. Heritage Press, 1958. p. 145. 注：粗体为作者所加，希望能够提醒读者关注定冠词“the”在此处的使用意义。在英语中这种用法常见于称呼某个独特的人或事。

② [古希腊] 柏拉图著，杨绛译：《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③ [古希腊] 柏拉图著，杨绛译：《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

自于民间的、所谓的“俗文学”形式所经历的评价标准变迁历程，揭示出西方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存在的一种对俗文学与雅文学之间孰优孰劣的评价标准的动态变化。

其次来看作为文学作品载体的文学语言。

自古罗马时代起，拉丁文便是通用的正式书面语，千百年来一直具有相对于各种地方方言来说更加优雅和简洁的美誉。但是，这一评价标准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诗人、学者但丁（Dante，1265—1321）《论俗语》一文的强烈质疑^①。在《论俗语》中，但丁热情地赞扬“俗语（vernacular，地方方言）”的优越性，认为研究这种语言“极为必要”。它不仅简明易学，而且是拉丁文的根本来源。但丁提出，“罗马人所称的文学语言”——即作为官方用语的拉丁文，就是从作为“俗语”的意大利语中“派生”出来的。它不仅被广泛使用，而且相较于所谓的专门的“文学语言”来说，“俗语”是“自然的”，而后者是“人为的”，因此俗语理所当然比后者更加“高贵”。^②但丁的这种说法与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大相径庭，在当时是一种革命性的颠覆。

在但丁生活的时代，原本通行于各个书面表达领域中的拉丁文因为规范甚多，往往只有上层的僧侣阶层才能看懂，所以其传播范围难以延伸至普通读者。这也导致文学成为上层阶级所专享的“高雅艺术”。虽然从11世纪开始，伴随欧洲各地方近代语言逐渐兴起，大部分民间文学如传奇故事、抒情民歌、叙事民歌等都开始用各地方民间语言创作，但它们主要以口头形式创作与流传，官方的拉丁语仍然是经典文学与学术论文的专用语言（即便

① 根据朱光潜的考察，但丁所谓的“‘俗语’是指与教会所用的官方语言，即与拉丁语相对立的各区域的地方语言”。

② 参见[意大利]但丁著，柳辉译，伍蠡甫、胡经之编：《论俗语》，载《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7～138页。

是但丁的《论俗语》本身，也是用拉丁文写成的）。^①由此可见，但丁提倡俗语，不仅是出于其在文学观念方面的信仰，也是着眼于文学的实际传播效果。但丁对俗文学不遗余力地推崇，是试图将由知识获得与文学审美带来的愉悦普及给广大不懂拉丁文的一般读者，使文学从只能在少数特定人群中传播的“孤芳自赏型”的“精英（elite）文学”，转变为面向大多数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识字阶层的“大众（mass）文学”。

但丁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俗语的重要性，在实践层面上，从其早期从事抒情诗（lyric）创作时，就已经大胆地采用了俗语的形式。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但丁对于俗语的推崇并非是特殊的个案——当时，圭尼泽利（Guido Guinizzelli, 1235—1276）、卡瓦尔坎蒂（Cavalcanti）等与但丁交游甚密的意大利诗人们互相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文学创作圈子。他们尝试用俗语进行诗歌创作，不仅互相唱和，而且经常讨论这一理论话题。^②正是在这种俗语写作潮流的影响之下，但丁最重要的著作《神曲》（*Divine Comedy*）也采用了俗语的形式。^③这为他的作品带来了在风格与韵味方面迥然有别于拉丁语传统经典的独特魅力，受到当时文化界大多数精英文人的赞许和推崇。同时，也正是因为采用了源自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通俗易懂的俗语，但丁的作品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广大普通读者的一致欢迎。

从这一历史事实的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至少在但丁生活的文艺复兴时代，俗语已经引起了欧洲许多作家的重视。当时的人们不再将文学欣赏的视野局限在古代传说，或者是基督教的经典文本当中。现实中的人类生存境遇与情感状况同样是诗人想

① 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137页。

② Havely, Nick. *Dant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pp. 115—123.

③ Barolini, Teodolinda. *Dante and the Origins of Italian Literary Cultur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93—220. pp. 333—350.